

目 录

特殊使命·····	云 广 英 (1)
八年苦斗·····	张 如 屏 (13)
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宜宾特支·····	陈 林 (61)
南京怒潮·····	汪季琦、王 枫 (69)
静斋风暴·····	张仲碧 (82)
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军分校·····	周见非 (97)
革命熔炉 抗大·····	刘祖靖 (108)
抗大各期概况——教育方针、教学	
原则——教学方法——各种制度——	
教员队伍的建设——政治工作	
抗大二分校的回忆·····	高克恭 (141)
争取任丘伪军起义的经过·····	杨建新 (147)
在黑雾中战斗·····	张持平 (158)
皖南事变的枪声·····	石 平 (171)
第一个中共广西省委·····	黎晓沧 (177)

风雪征途

- 东北抗联第十一军西征记……卢连峰(187)
- 晋夫烈士永生……乔锡章(193)
- 难忘的鄂东南兵工厂……王只谷(203)
- 精兵简政度过难关……赵恒远(211)

书信·日记

- 战争中的九个新年……王紫峰(215)

综合资料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编成情况(下)

- ……李国祥、张国琦、殷纯俊(220)

特殊使命

云 广 英

（全国政协常委）

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后，一方面同陕北红军团结合作，对敌作战；另一方面对被蒋介石所歧视、压制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西北军进行统战工作，将东北军和西北军变敌为友。这对于抗日力量的扩大发展，是极其有利的。

我参加长征期间，在干部团工作。到达瓦窑堡后，组织上分配我到红军大学政治部工作。政治部主任是杨尚昆同志，副主任是莫文骅同志，我担任政治部组织科长。经过一年时间的长征，经受了艰难困苦，许多干部战士都身体不好。当时陕北地区的党、政、军、民对胜利到陕北来的中央红军非常关心爱护，在物质生活上给予积极支援，使同志们很快恢复健康。一九三六年六月间，我们听到华南发生“两广事变”，即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进行“反蒋抗日”活动。并向全国发出“立即北上抗日”的通电，但详情却不得而知。

大约过了半个月时间，有一天，李克农同志到红军大学政治部来找我谈话。他说：“六月一日两广发生事变，广西的李宗仁和广东的陈济棠等联合搞‘反蒋抗日’活动，并发出通电。这无疑是国民党内部分裂的表现，其真相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地方势力派的矛盾，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以促进抗日斗争运动的发展，这是必要和有利的。中央准备派你出去，以红军代表的名义向他们进行抗日民族统战工作。你是广东人，大革命时期你在广州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二九年冬你又到广西右江参加红七军，你对两广地方情况比较熟悉，我认为你出去活动是合适的。你的意见怎样？”我回答说：“我是共产党员，完全服从党的决定去工作，不过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希望给我多多指示，使我顺利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李克农同志又说：“过几天再谈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你同意去就好了”。

过了三天，李克农同志又到政治部来同我谈话，他说：“中央领导同志今天开会，明确了你往两广去的工作任务，现在你同我到中央办公厅去。”李克农同志同我到中央办公厅时，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叶剑英、张闻天等同志均已在座。周恩来同志对当时形势作了分析，明确地指出我的工作任务。最后又指示我说：“你到南方后，在香港或广州、南宁地区时，如遇到宣侠父先生，你可以同他谈工作问题，也请他谈当地的抗日斗争等情况，他是进步的人士，他会帮助你进行工作的。关于你到南方后与中央如何联系，由李克农同志同你详谈。”当我和李克农同志离开中央办公厅时，毛主席握着我的手说：“你这次出去工作很好！”我回来后的第二天，李克农同志来指示我到两广后与中央的联系事

宜。他与我约定电报的密码、呼号和波长等。并说要发出电报时，先译成密码，然后托两广当局电台代发，只要把通电报的呼号和波长告诉他们，那就可以通电报了。

过了几天，准备工作做好了，中央另派白坚同志陪同我到天津，再转南方。于是我们离开瓦窑堡往延安（当时称肤施，是东北军的驻地）。由张学良部队的王副官带我们乘军用车通过延安到西安。到西安后，王副官带我们到西北军政治部负责人申伯纯先生的接待室住着。这个接待室只能住几个人，是申接待他私人客人住用的，似乎是秘密的接待地方。我们这次到西安来，得到许多方便，无疑是统战工作的成果。

在西安住了几天，我和白坚同志买了一些化装用的服装用具，准备好后，就乘火车往天津。到天津后住在一家俄国人开的中等旅店，由白坚同志出去找北方局同志取得联系。过了两天，王世英同志来看我们。我过去没有与王世英同志接触过，这次经过白坚同志介绍才认识。他很热情地同我握手交谈。我就把我去两广的任务告诉他。他把了解“两广事变”的情况对我陈述。他说：“‘两广事变’的真相，我们这里了解也不太清楚，但是他们同蒋介石闹矛盾是无疑的，对他们进行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同我们联合‘迫蒋抗日’是很必要的。听说事变后，广东的陈济棠部队中的军长余汉谋已投靠蒋介石。因此，目前在广东的局势较混乱，陈可能已离开广州往香港了。广西方面没有什么变动，可以往广西南宁去找李宗仁等进行统战工作。”我同意王世英同志的意见。王世英同志另指定一家旅店要我们去住，说到那里去住较方便。我和白坚同志迁到那家小旅店去住的第二天，王世英同志又来看我们。他个别同我说：“经过调查了解，陈济棠已经逃离广州去香港，

你不要去广州，到香港转途到广西南宁去找李宗仁等好了。李宗仁在天津有秘密电台，他们与我们有统战工作上的关系，为了你找李宗仁等的方便，我们与他们商谈过，可以由他们发电报给李宗仁、白崇禧，告知你不久就要到南宁，这样去会见李宗仁等就不会那么麻烦了。不过你要改名为林秀先。这事已同他们谈好了，……”。王世英同志还同我约定，以后我回天津时联系的方法暗号。过了两天，我个人就由天津经上海赴香港。在香港住了几天，偶然遇到我族兄云旭斋，他在澳门经小商，经常到香港来做买卖。他把广东情况向我谈了。我一个人就往广西，当我到南宁上岸时，就有几个桂系警察来严密的检查，并指定我到南宁某旅店去住宿。我想他们是防止蒋介石派人到来搞破坏活动的吧。检查完后，我到指定的旅店以林秀先名字住下。当天晚上，我写好一封会见李宗仁的信，信写好后放在床的蓆子下面。大抵是十点钟左右，有两个警察来查房。他们进入我住的房后，询问我的姓名，从那里来的。我回答后，他们到处搜查，验查行李后，就翻蓆子，发现我写的信，即询这信是你写的吗？我说是。我又对他们说：“我准备明天去找你们的李总司令，希望你们带我去好吗？”他们说：“总司令部离这里不远，你自己去好了。”谈完后他们就走了。第二天的早餐后，我就拿着给李宗仁的信出去，我发现有两个警察跟在我的后面走。我到李总部的传达室，即将给李宗仁的信交去。不多久，大抵是一个参谋或副官请我到李宗仁总部的办公厅。我进去时，李宗仁正在厅间，他身着军服，穿着一双黑色的长统皮鞋，站立在厅的中间。还有两个卫兵立在厅的一旁。李宗仁同我握手并微笑着说：“我早已知道林先生要来，今天得到会面，很好！”他请我坐下后，立即挥手要两个卫兵退出去。接着就向我们毛主

席、朱总司令问好。我对他表示感谢。在同他交谈时，没有别人参加。我当时不了解“两广事变”的真实情况和他们的意图。所以只对他讲如下几点：第一，说明目前形势的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中国本部进攻，他们无疑是要占领全中国。最近“冀东事变”和“外交谈判”显示了这个趋势，严重地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和民族的危亡。目前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坚决抗日，反对内战，反对对日寇妥协投降，坚决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我们党很早就提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我们全国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我相信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斗争，这个任务一定能够实现的。第二，我们反对蒋介石对日寇妥协、投降的政策，因为他长期以来不顾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对日寇不抵抗，对国内打内战，造成了今天中国的严重民族危机。我们认为他们这种顽固反动的主张和行动，是难以容忍的，其恶果是使亲者痛，仇者快。我们红军离开南方北上到西北，其目的是以积极的行动来抗日，推动全国抗日斗争的发展。而蒋介石则派大兵来阻止我们，围攻我们，这无非是帮日寇侵略中国的大忙，大失民心！第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主张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这个武器来组织和团结全国人民大众和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斗争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汉奸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进行坚决斗争。我们认为只有走这一条道路才是正确的，才能战胜日寇，才能解救中国。除此别无他途可走。如果国民党当局还搞

所谓什么“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继续打内战，对日寇妥协投降，其结果是大大削弱了我们反侵略的力量，大大方便于日寇的入侵，致使中国灭亡。我们党中央这次派我到广西来，就是为着商谈关于合作抗日的问题。我认为只有全国各方面愿意和决心抗日的力量都团结起来，互相配合，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促进全面抗战高潮的到来，那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日寇，取得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我谈这些问题时，李宗仁没有插话，但多次点头说对。最后他说：“林先生所讲的话很好，我没有什么意见。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完全赞成。我们正在进行促进抗日运动的发展，希望今后在抗日斗争中我们互相配合。”他又说：“我最近工作比较忙些，我过后通知王公度主任同林先生联系，有什么事情希望与他交谈，……。”他送我出会客厅的门前。我回旅店时，途中没有警察跟踪我了。过了两天，王公度到我住的旅店来看我。只谈了半小时他就走了。他把他居住的地址告诉我，并说过后请我去谈。当时他对我是欢迎的。但他对“两广事变”的情况不多谈。

又过了一天，宣侠父同志来看我，他表示很高兴。他告诉我香港党的组织已派胡鄂公等到南宁来，对广西当局进行统战工作。他本人是陪同胡等来的。他把“两广事变”的经过告诉了我。他说，陈济棠因为部下军长余汉谋投蒋后，广东方面较混乱，已去香港，我们不要到广州去活动。我把我出来的任务告诉他，要他以后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我。我对他说：“我已经会见过李宗仁。李很注意听我的讲话，并表示赞同我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我想他们是乐意与我们合作进行‘迫蒋抗日’的。

你认为怎么样？”宣说：“广东的陈济棠部队已经分裂，李宗仁现在比较孤立，他们是会愿意同我们党合作的。胡鄂公本人与李济深会谈过，关系尚好。李济深表示很乐意同中共合作，通过统战关系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他在华南国民党地方势力派中的威信较高，但是没有实力。他与李、白关系是好的。”宣侠父同志又对我说：“胡鄂公等很想来看您，您是否可以同他们谈谈？”我立即回答：

“他俩是香港党组织上派来工作的，我很想他们来谈谈，多了解些情况更好。请你通知他们，明天上午到我这里来谈好了。”第二天上午，宣同志与胡到我住的地方来。我告诉胡说：“我是党中央派来两广对李宗仁、陈济棠等进行统战工作的。请你们多帮助我了解两广的情况，因为我离开南方七年了，这方面的情况我不熟悉。党中央对这次‘两广事变’的真实情况也不太清楚，当然早已看到两广地方实力派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蒋介石长期以来对地方实力派和进步的民主党派是歧视和压制的。两广当局提出‘抗日救国’的口号，当然是进步的表现。他们实行‘抗日救国’的主张，我们当然是赞成的，是应与他们合作的。我出来工作的任务，是向他们宣传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争取他们同我们一道进行抗日的斗争。我们从多方面进行统战工作，对团结更多抗日力量来‘迫蒋抗日’是有利的。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我对胡谈这些问题，他没有发表异议。过了一天，胡派宣侠父同志来对我说：“李济深是拥护我们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的。你是否可以去看他，同他谈谈？”我回答宣侠父同志，请你通知他：“后天上午我去看他好了”。早在一九三二年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初期，李济深先生同我们党有统战关系。侠父同志告诉我：“他

现住在宜园。这是广西当局接待各地来的代表的宾馆。你自己去找他好了。”我按照约定时间找到了李济深。我到他的会客厅后，他热情地同我握手，并立即向毛主席、朱总司令问好。我答：“很好！谢谢你的关怀。”我同他谈了约一小时，其内容与对李宗仁所谈的基本一样，他没有多说话，只表示说：“中共所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正确。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国各方面的力量来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进行斗争，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我们民族的危亡。蒋介石个人独裁，对日妥协投降，不顾民族之存亡。我是一贯反对他们的。‘两广事件’的发生原因就在于此。”他说这几句简单的话，表现出他是愿意同我党我军合作抗日救国，反对蒋介石对日寇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的。我对他说：“李先生的主张很好，我很赞成。我们党很早就提出在国难当前，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把日寇打出去，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我想全国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都是赞成的。”谈到此我就同他握手告别了。

我同李济深会谈后的第五天，胡鄂公来看我。他说：“李济深很进步，李宗仁等也很尊重他。我们对李宗仁要谈的什么问题，最好经过他去对李宗仁谈效果更好。林同志以后要对李宗仁谈什么问题可告诉我，由我同李济深谈好转告李宗仁，你意见如何？”我说：“中央是派我直接与李宗仁等商谈问题的，不应通过别人来做间接的会谈。我认为你提的意见不妥当。这样做会使李宗仁对我们不满意。”我讲后，胡表现得很不满意而告别了。过了两天，胡又来找我谈，他不让宣侠父来。胡对我说：“今天要对林同志谈些重要的问题。在这里谈不方便，是否可以出去到公园里谈谈？”我说：“好。”于是，我们就同到南宁公园中去。一九二九年秋，我在南

宁时也常常到这个公园散步，这地方我比较熟悉，就同到一块人少来往的地方去谈。这天胡鄂公的神情似乎不太正常，又表示出对我很关心的样子。他开口就说：“林同志这次来搞统战工作很好，可是广西当局对你是否中共中央派来的有些怀疑。在这情况下，我们的意见是林同志能否先回西北，把党中央指示你出来的工作任务交给我们来办。你如果不快离开广西，万一发生意外那就不好了……”我听了，认定他是有意搞鬼，以制造谣言和威吓的恶劣手段来骗我走，使他能假用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名义进行活动，这无疑是对统战工作极为不利的。因此我就毫不客气而又严肃地批评他一番。我说：“我出来经天津时，是我们的同志同李宗仁设在天津的秘密机关负责人商谈好了，并由他们先发密电给李宗仁等告知我要到南宁来，当李宗仁会见我时，他就说早已知道林先生要来的。他们对我是没有什么怀疑的。党中央是派我来工作的，我没有完成任务之前是不会离开广西的。你们没有权利代替我来进行活动。你所提的意见是非常错误的。至于我会遭受什么意外，我是不怕的，如果害怕什么意外，我就不会经过遥远的敌占区来此了。我在这里进行工作，你们只能帮助了解些情况，不许插手干预。不然的话，你们过后就不要同我联系。”经过批评，他无话可说，我就走了。

过后，我搞好一份密码向党中央报告的电报，亲自拿去要王公度代发，并把呼号和波长都告诉他。他满口答应一定会代发。这份电报的内容主要是，报告我已经会见李宗仁和李济深。他们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同时赞成我党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愿意同我们合作进行抗日救国。陈济棠已下台，逃居香港。广西方面仍继续搞“反蒋抗日”活动。他们反蒋是真，但是否真正抗日不

太清楚。在我未到南宁之前，香港党组织已派胡鄂公、宣侠父等来桂进行统战工作活动。胡在工作上对我没有帮助，反而造谣说李宗仁等对我有怀疑，要我先回西北，把任务交他们去办，我坚决反对。他们可能是假冒中央派来的代表的名义骗李宗仁等的。这事情如何处理，请指示。这份电报交王公度代发后，约一星期之久，王来告诉我：“至今还联系不上，什么原因不清楚……”这时，我很焦急，拟赴天津找王世英同志。凑巧得很，过两天王世英同志来到南宁同我会晤。王同志说：我担心你是否已安全到来南宁，所以特来看你，并了解两广的情况。我便告诉他来到南宁后的经过和进行工作的情况。同时我把胡鄂公胡闹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他。世英同志说，究竟是什么人派他们出来的，我也不清楚。我说，宣侠父表现较好，可是受他们控制也无能为力。王世英同志说，不要理睬他们好了。他们绝对不是中央派出来的。我说，最近他们都不敢到我处了。谈了一小时多，王世英同志就走了。过了三天，世英同志又来同我谈。他说，最近广西情况还没有新的变化，我准备赴香港后回天津。我说我留下继续工作，并要他回到天津后把广西的情况和胡鄂公胡闹的行为报告中央。世英同志不几天就回天津了。

八月中旬，我听到蒋军已派大兵来包围广西，南宁市面上也有些混乱，有些商民逃离南宁。广西的纸币大跌价，听说不少人都争先恐后地把广西纸币去换港币。也听说蒋介石收买广西的空军，有一些空军人员和飞机跑了。有一天，王公度来到我处，说：

“有些事情要同林先生商谈一下，是否可以？”我说“可以”。他说：

“最近蒋介石已派兵来威胁我们，无非是迫我们停止‘抗日救亡’活动。目前情况比较紧迫，如何对付他们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林先生对此有什么意见？……”我思考了一下，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党的方针是“迫蒋抗日”。如果南方打起内战来，对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是不利的。因此，我就对他说：“中国不断打内战，我们党多次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其目的是为着坚决反对日寇的侵略，维护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而蒋介石顽固地坚持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大打内战。这是为亲者痛、仇者快的反动政策。我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还是以和平谈判的办法来解决为上策。不过在谈判中，必须以迫蒋停止内战和一致抗日为前提，并立即把蒋军围攻广西的武装全部撤走，这是主要的条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供你们参考。我想和平解决后，继续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加强各方面抗日力量的团结，‘迫蒋抗日’也是可能的。请你把我个人的意见转告你们李总司令。”王公度说：“林先生提的意见很好，我一定向李总司令报告……”我俩简单谈了这一切，他对我表示感谢就走了。大抵过了十几天，蒋方与广西当局经过和平谈判，在九月上旬得到和平解决了，但是谈判的具体内容我不太清楚。和平解决后，南宁的社会秩序逐渐转为安定。

蒋、桂两军经过和平解决问题后，九月中旬，我就离开南宁赴天津。当离开南宁之前两天，久不来见我的胡鄂公到我住处来。胡一见我就说：“广西当局与蒋军经过和平谈判已取得和平解决。李济深先生写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他托我携来给林同志亲自带去，转呈给毛主席”。胡把信给我看。这封信只有三百个字左右，基本内容是表示对我们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拥护，诚意地同我们合作进行抗日救国运动。最后提出今后在军事行动上同我红军密切配合。我看完这信后对胡说：“我同意把李济深的信带去

呈给毛主席，这是不难办到的”。我当时认为把李济深给毛主席的信藏在身上是不妥当的，万一被敌人查出来，就麻烦了。我决心把这封信的内容念熟，就把它烧掉，到延安后写出来呈给毛主席就是了。

九月中旬，我离开南宁后经香港赴澳门。我族兄云旭斋已通知我妻陈英和小女孩泊娟到澳门住着。陈英同志一九三〇年参加红七军后，因为怀胎，组织上决定她不要随军到江西中央苏区，不得已回乡务农。她坚决要偕我到红军中工作。我同意。就偕她离开澳门经上海到天津。到天津后的第三天，我找到了王世英同志。他留我们在天津逗留几天。他要我亲自带呈给党中央的密件。办妥后，我们就离开天津乘火车到西安。到西安住了一段时间，才经过申伯纯先生的关系找到张纯清（即张文彬）同志。纯清同志当面告诉我说：“叶剑英同志现在西安。你是否快点去看他？”我很高兴地回答：“我出来工作已经几个月的时间，我往南方工作的情况必须快点向中央汇报。请你对他谈好，约定地点和时间，我就去看他好了”。我把北方局送给中央的密件交给张纯清同志，由他转呈中央。过了两天，我偕张纯清同志去看叶剑英同志。见面时他就欢笑地对我说：“你这次出去工作，现在顺利地回来，很好！”我就详细地把去广西进行统战工作经过的情况向他汇报。最后又把李济深给毛主席的信全文写出来呈给他阅，并请他转呈给毛主席。叶帅说：“你的记忆力很好，这信由我转呈给毛主席好了”。

从此，我又开始了新的工作。

八年苦斗

张 如 屏

(全国政协常委 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安徽中部的寿县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革命斗争形势的影响下，一些幸存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掩埋了烈士的遗体，揩干了身上的血迹，又重新站了起来。在无数血的代价和斗争实践的基础上，逐渐认识到：“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皖西的工农武装割据以及皖北、皖西北白区里革命的游击战争活动，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一九二九年底，我在广州南石头监狱经受了两年多的折磨，终因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经老同盟会会员李雨村保释出

狱，临出狱前，狱中支部书记郭成荣找我谈了话，在离开广州、路经香港、最后到达上海的路上，我的联系人、途中临时党小组长高国玖告诉我：“狱中党组织安排你到东北工作或去苏联学习”。到上海后，刚同党中央与我们的联络人吕共器见了一面，第二天吕就被敌人逮捕了。联络从此中断，上海又无其他栖身之地，不得已，我们只好暂回故乡，听候党中央的指示。

一九三〇年初，我回到了离别三年多的故乡——安徽寿县杨家庙。第一个急需办的事情，就是筹集经费。可是，家里没有钱，只好将田地当掉一部分，换来了二百元大洋。正当我准备动身去上海找党中央时，却得了伤寒，卧床不起。只得把钱交给一同从广州监狱出来的戴关宇，让他先去联系。送走戴关宇不久，寿县中心县委书记曹鼎来告诉我：“我们知道你从黄埔军校回来后，立既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请求把你留下来。”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件事，只表示听候中央指示，服从组织安排。中心县委的报告，中央很快就批准了。于是，曹鼎就把我编入董庄子党支部，从此，我又投入了新的战斗，开始了在安徽的革命生涯。

在安徽，土地革命战争的烈火，首先是在六安，霍山一带燃烧起来的。一九二九年五月六日，继黄麻起义之后，皖西金寨县爆发了著名的立夏节起义。同年十一月，六（安）霍（山）地区又爆发了总起义，即六霍起义。这两次起义，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安徽的反动统治基础，创建了皖西根据地和工农武装，为白色恐怖的皖西北树立了一面红旗。

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正式成立。为了统一红军的领导，特委将分属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三块根据地的红军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合编为红一军。军长由中央

军委书记周恩来同志派许继慎担任。政委是曹大骏。后又改为第一军第一、二、三师。一师师长记不清是谁。二师师长是金寨县白沙河楼房村的周维炯。三师师长张惠堂，政委鲍益三。

三月份，我的病刚刚痊愈。因六霍地区缺少军事干部，而寿县党的组织成立较久，从黄埔、武汉等军校回来的人比较多。在六霍中心县委的请求下，曹鼎把我推荐出来，被派往三师一〇八团担任党代表。该团有三个营，实有四百余人，武器较好，钢枪占多数。政治工作做得好。地方上一些表现好的党员，只要连排长一看上了，就被吸收到部队里来。所以，从武器到组织以及全团战斗力都是很强的。

在这期间，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和消灭当地民愤大的地主、土豪劣绅与还乡团。同时，我们还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始了青山战斗。青山，是六安东部的一个大镇，以产茶而著名。国民党一个营的兵力，就驻在该镇的茶场。青山战斗，虽没有全歼敌人，但给自己增添了武器装备。不久，攻打金家寨的战斗开始了。

金家寨，即今天的金寨县。它地处大别山北麓，除县城以北有少数丘陵外，其余地区皆是山岭纵横，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首次攻打金家寨，正是梅雨季节，泥泞路滑，行动困难，我病倒了。一天，师政委鲍益三看到我这个样子，就明确告诉我：“你去军医院治疗，同时担任医院党代表。”之后，又亲自派人用他的马，把我送到由三师代管的军医院所在地燕子河。

到了军医院后，我认识了郝正理院长，他是霍山人，又是职业医生。过了几天，我的身体略有好转，就率领担架队，参加了攻打金家寨的战斗。这次战斗，我们集中了较多的兵力，猛打猛攻，一举克复金寨县城。但没有料到，卫立煌纠集部队，趁我立